

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 “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

李永斌

摘要：希腊“东方化革命”的概念最早于1990年由博德曼提出，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一书使其广为人知。“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本身不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概念，而是混合了诸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也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关键词：东方化时代 东方化革命 古典主义 东方主义 古希腊

作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也较为迅速的反应。有学者提出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一时期，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本文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以及对“东方”、“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的考量，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等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但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东方化革命”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 本文系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古代希腊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研究”（SZ20131002801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希腊‘东方化时代’研究”（14BSS035）的阶段性成果。

一、“东方化革命”的提出

希腊“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 1990 年，英国古代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文中使用了“东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他在该文中指出，“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始于公元前 900 年左右，开始是零星的工匠移民和物件的引入。希腊大陆上真正的东方化革命，是公元前 8 世纪的一种现象，由北叙利亚及其他地方——而非（通常认为的）腓尼基——之技术和物产在希腊的出现而产生，东方化革命影响广泛而深远。”^① 博德曼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关于阿尔明那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以此说明阿尔明那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高于腓尼基，顺便探讨阿尔明那这一交通要道在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他没有预料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会在此后的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因此也没有对“东方化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

真正使“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广为人知的是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他于 1992 修订自己的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② 并与玛格丽特·品德尔（Margaret E. Pinder）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时，直接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③ 实际上，英译本《东方化革命》是一部标题大胆、行文谨慎的作品，伯克特没有在“东方化革命”这个概念上过多纠缠，主要还是以翔实的史料对具体文化事项加以细致考证——如迁移的工匠、东方传往西方的巫术和医学、阿卡德文学与早期希腊文学的关系等。在全书正文中，他没有提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只在导论与结语中简单地提了三句：导论最后一句介绍性地说，“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④ 结语则总结式地说：“随着青铜浮雕、纺织品、印章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一幅完整的东方画卷展现在希腊人面前，希腊人

① John Boardman, “Al Mina and History,”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9, July 1990, pp. 169-190.

②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最初发表于《海德堡科学院会刊》（*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1984 年第 1 期。

③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trans. Margaret E. Pinder and Walter Burke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伯克特在其英译本导论的注释中特别指出，“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博德曼 1990 年的著作。

④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8.

在‘东方化革命’的过程中如饥似渴地对其加以吸收和改造。”^① 对于“东方化革命”本身的含义，伯克特也没有进行定义式的阐释，只在一般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变革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里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伴随着实际需求和利益、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从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像东方化革命时期这样的变革阶段恰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还在于希腊人在西方民族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②

尽管伯克特没有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进行详细论述，但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③ 1994年，卡罗尔·托马斯（Carol G. Thomas）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关于《东方化革命》的书评。她充分肯定了伯克特严谨、出色的研究，认为伯克特“在没有否认希腊自身天赋的同时，展示了这样一种希腊奇迹是在其他文明广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事实。尽管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某些借用其他文化的特定实例仍然存疑，但是在伯克特修订自己德文版作品的严谨学术活动中，他已经在自己创建的体系中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看到了伯克特刻意强调希腊文明的东方背景，突出了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吸收与改造，意欲凸显希腊文明自身的优越性与包容力。同年7月，萨拉·门德尔（Sara Mandell）也发表了一篇书评，认为《东方化革命》是论述希波战争之前东方世界和希腊文化交互作用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还限于较小范围，但是正在迅速增长。^⑤ 她同样着眼于伯克特对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而没有强调“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

①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28.

②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29.

③ 实际上，该书的德文版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参见 Günter Neumann,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alter Burkert (Review),”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8. Bd., 2. H., 1985, pp. 304-306; P. Walcot,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alter Burkert (Review),”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ies, vol. 36, no. 1, 1986, p. 151; M. L. West,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 Burkert (Review),”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06, 1986, pp. 233-234.

④ Carol G. Thomas,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Margaret E. Pinder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9, no. 1 (Feb. 1994), pp. 202-203.

⑤ Sara Mandell,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1996 年，马丁·伯纳尔发表了关于《东方化革命》的长篇书评，他认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比其中庸的标题所展示的要更为激进”。^①伯纳尔认为，伯克特极力主张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主要来自利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安纳托利亚，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像一些保守正统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限于艺术风格和字母。伯纳尔以其《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②中的激进观点而著名，他自己的风格本身就是“标题新奇、观点激进”，在《黑色雅典娜》招致尖锐批评、自己与学术界同行进行激烈辩论之时，不免有在伯克特这里找到知音之感。实际上，伯纳尔是以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来考量伯克特的论述，他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文明研究领域确有创新之功，其基本观点与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论同气相求。

当然，伯克特与伯纳尔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伯克特认为文明的发展并非遵循简单线性的因果论路线，多种文明间的交往是一种互动推进式的开放演进，单纯考察文明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关注其内部与外部的互动与交流，因此他倾向于强调希腊文明产生时期的希腊社会本身，而将东方的影响作为背景来看待，因此将“东方化革命”的时间限定在公元前 8 世纪到前 7 世纪，内容限定在具体文化事项方面。而伯纳尔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批驳伯克特道，“这个世纪或者其他任何世纪，都没发生过东方化革命”。^③当然，他的真实观点不是否定“东方化”的存在，而是认为希腊一直处在东方化过程之中而非只经历了有限的一段革命。他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个阶段存在一个“纯正的”希腊，正如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存在“纯正的”利凡特或“纯正的”埃及一样。任何试图标明闪米特和埃及对希腊影响起始时间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标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一样。希腊化或希腊本身不可能锁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之内——只可能将其视为一种风格或模式的延续，在这种模式下，希腊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介入相互交织或混杂在一起。

然而，“东方化革命”在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了 20 多年，却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完整清晰的界定。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参与讨论的学者长于史实推考而不擅理论概括，似乎只要列出有限的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

①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Review),”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87, no. 6 (Jul. -Aug. 1994), p. 517.

① Martin Bernal, “Burkert’s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Review),” *Arion*, Third Series, vol. 4, no. 2 (Fall 1996), pp. 137-147.

②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vol.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2006.

③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17.

史料证据，便能自然而然地对这场“东方化革命”予以足够的证明，而无需再做定性分析。

“东方化革命”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虽然现代西方学者没有对希腊“东方化革命”概念进行系统阐释，但博德曼、伯克特、伯纳尔等人从史料的角度进行具体考证，说明东方对西方的影响；萨义德等人则从另一角度，即以批评东方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来揭示历史上东方的影响和地位。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东方化革命”的基本内涵——大约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

“东方化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念，其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Orientalizing)和“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

“东方化”这一词被用作指代古希腊艺术的一种风格，始于维也纳大学古典学教授亚历山大·孔兹(Alexander Conze)。他于1870年在《早期希腊艺术史》中提出这一说法，认为“东方化”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指涉19世纪前半期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墓冢中发现的瓶画风格。东方化风格瓶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与原型物件没有关系的几何风格，考古学家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中部以及1845年以来在亚述的发现，即花卉旋纹和狂野的动物以及奇幻的怪物，都被认为是来自东方。这类东方化风格同样出现在希腊艺术中，尽管至19世纪中期希腊只出现了少数考古证据。^①自此以后，学术界对希腊艺术中东方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密切。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古希腊文明中来自东方的因素不仅限于艺术领域。

1980年，英国学者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在孔兹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他的《早期希腊》^②第六章即以“东方化时代”为章名。^③默里借用了这个艺术史概念并且将其应用到整体希腊社会的研究。他通过考察希腊语借用的闪米特词汇的数量，尤其是物质文化领域的词汇，例如陶器形状的名称、称呼服装的语汇、渔业和航海业的术语等，确认了希腊和腓尼基之间的密切接触。默里认为，“与近东的接触，给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一个世纪的希

① 转引自 Corinna Riva and Nicholas C. Vella, eds., *Debating Orientalizatio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hang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06, p. 4.

②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1993年，作者作了较多修订后出版第二版(London: Fontana Press)，其中译本为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 默里在1993年第二版序言中确认是他本人首次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有些章节变动很小……因为其基本结论似乎仍值得保留，而随后的研究已经从这里开始。我对其中的两章感到特别自豪……第六章即‘东方化时代’，如今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时期得到认可。首次借用了这个艺术史概念并且将其应用到作为整体的社会，正是本书。”

腊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不过，这种传播发生的路径，以及它对希腊接受者的影响，最好通过三个领域——艺术、宗教和文学——的研究来探讨。”^①

默里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之后，西方古典学界的注意力开始逐步集中到东方化论题之上。1987年，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甫一面世便引起激烈争论，激发了学界对希腊文明中东方因素的研究热情，相继发表了相关著述。

美国古典考古学家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在1992年出版的《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从青铜时代直至古风时代，东部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常态，而希腊也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100年之后没有终止和东方的联系。^②

1997年，英国古典学家韦斯特的《面向东方的赫利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面世，作者考察了爱琴地区与东方的来往和交流，系统阐述了西亚文化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在事实的冲击下，读者应该放弃或至少大大降低对于早期希腊文化独立性所保有的任何幻想。我们不能把‘近东’的影响贬低为边缘现象，只是在解释孤立的不正常现象时才偶尔援引。它在许多层面、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无处不在。”^③

1998年，考古学家塔马斯·德兹索（Tamás Dezsö）在《不列颠考古报告》发表长篇文章《公元前9—前7世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东方化的模式》，^④他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分为四个层次：直接引入、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形式上的重新解释、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材料上的重新解释、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头盔受到东方的启发。通过对具体文化事项的专题研究，德兹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影响的个案研究样本。

总之，一些学者将“东方化革命”的命题纳入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的研究框架下，形成了“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基础就是“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因此，要理解和辨析“东方化革命”，前提是考量“东方”、“东方化”以及“革命”等基本概念。

①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74—75页。

② Sarah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她在《荷马与“近东”》一文中也概括了希腊和东方的密切联系，参见“Homer and the Near East,” in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Leiden: E. J. Brill, 1997, pp. 599-623.

③ M. 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0.

④ Tamás Dezsö, “Oriental Influence in the Aegea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Helmet Traditions in the 9th-7th Centuries B. C.: The Patterns of Orientalization,”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o. 691, 1998.

二、“东方化”的史实基础

许多现代语源学研究者将“东方”、“西方”两个词的词源上溯到腓尼基人传说中的卡德摩斯（Kadmos）和欧罗巴（Europa）甚至更为久远，^① 不过古代希腊人尚无“东方”的概念和意识。^② 我们在论及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希腊”与“东方”这些二元对立概念都是现代术语。尽管这些术语本身是现代性的，不过指称的事项却是历史的具体存在。

探讨这些概念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东方”究竟是一个地域的还是文化的范畴，或者其他方面的范畴。关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与“东方”以及“欧洲”与“亚洲”看做两对同等概念，即东西方地缘文化的区分与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是重合的——从爱琴海到黑海，中间是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波斯普鲁斯海峡。^③ 部分希腊人居住的土耳其西海岸和沿岸岛屿被称为“东希腊”，在传统上属于“西方”或“欧洲”的范畴。然而这种地域的划分不能准确表述文化或观念上的区别。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东方”是一个想象的地域，^④ 或者“东方”在地域上是不存在的。^⑤ 本文认为，地域上的“东方”概念是探讨“东方”内涵之基础，因此需要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地域上的“东方”也有不同的范围，本文大致以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作为地域上的西方与东方的分界线。以此为基础，在涉及其他范畴的“东方”概念时进一步加以界定和阐述。

从希腊人的认知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尚无“东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意义的“东方”在古典希腊时期已经出现。波斯的入侵使得希腊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开始把波斯人和希腊传说中的敌人联系起来，把他们一概视为来自亚细亚、对希腊产生巨大威胁的宿敌，因而也是与希腊对立的蛮族。正如默里所说，希波战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也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希腊文化已经从东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创造出来。

① 关于这两个词的词源解释及争论，参见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53, note 3.

② 东西方对立的观念始见于罗马帝国时期，后被基督教拉丁文学采纳。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东方”（Orient）才作为概念和术语，实际进入西方话语中。（参见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 p. 153, note 2）

③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1.

④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7, pp. 41-52.

⑤ Nicholas Purcell, “Orientalizing: Five Historical Questions,” in Corinna Riva and Nicholas C. Vella, eds., *Debating Orientalizatio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hang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 25.

东方对抗西方，专制对抗自由，希波战争中创造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回响。^① 希腊和波斯的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文化的特性，希腊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因此，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希腊”与“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是希腊人关于“他者”的一种认识范畴，这一范畴中的“东方”可以泛指在文化层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东方化”的界定。论及“东方化”时，必须考虑何种程度的性质或状态改变能够称之为“化”，还要考虑到“化”的过程、结果和状态。正如珀塞尔所诘问的：“东方化”是否包括了关于程度和完整性的判断？是否意味着一个稳定但不断改变的时期，或者是完全的改变？换句话说，如果“东方化”是一个过程，是否意味着结果就“东方化”了？若不是，为什么不是？^② 早在 1973 年，博德曼就以黑格尔关于东方和西方精神对立的模式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东方化”是希腊人主动地、有自主意识地转变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还是被动地、因袭陈规地接受来自东方的产品？^③

直到伯克特所处的时代，严谨的西方学者仍然侧重于从具体文化事项入手进行分析，拒绝在没有确凿证据之时就贸然建构文明互动与交流的模式。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前言中明确表示：“我有意侧重于提供证据，证明希腊与东方文化有相似之处，以及证明希腊可能采纳了东方文化。某些时候，当材料本身不能提供文化迁移的可靠证据时，确认文化间的相似性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能使希腊和东方的文化现象摆脱孤立，为比较研究搭建一个平台。”^④ 而我们能够据以为证的主要是艺术、宗教和文学领域的比较研究。

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艺术的“东方化”过程中，腓尼基人扮演着先驱的角色，尽管他们在艺术层面只是发挥了中转和媒介的作用。^⑤ 亚述帝国和埃及的艺术被认为是希腊艺术最重要的原型。^⑥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在东方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罗德岛在公元前 8 世纪时也十分重要；所有在公元前 8 世纪兴盛起来的重要朝拜地，如提洛岛、德尔斐，尤其是奥林匹亚，都发掘出了数量可观的东方工艺品；紧邻厄立特里亚的雅典也值得

①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 290—291 页。

② Nicholas Purcell, “Orientalizing: Five Historical Questions,” p. 26.

③ John Boardman, *Greek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p. 19.

④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8.

⑤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Greeks and Phoenicians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B. C.,”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01, Feb. 1996, pp. 47-67;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p. 65.

⑥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p. 66.

特别关注。^①

希腊艺术中的东方因素首先体现在手工艺品方面，最早的无疑是金属制品。从公元前9世纪后期起，克里特的腓尼基金属匠人已经开始生产锻造青铜器物用于献祭，考古学家在伊达山的山洞中以及奥林匹亚、多铎纳和伊达拉里亚地区都发现了他们的产品。腓尼基的青铜碗和银碗普遍被作为贵重物品交易，不仅在塞浦路斯，而且在雅典、奥林匹亚、德尔斐，甚至意大利南部的普勒尼斯特、伊达拉里亚等地都发现了这样的碗。上述地区发现的碗中至少有三个刻有阿拉米—腓尼基（Aramaic-Phoenician）铭文，法拉里（Faleri）出土的碗上还刻着楔形文字。^②

“东方化”最为显著的是陶器。默里认为，陶器的东方化风格首先出现于公元前725年左右的原始科林斯陶器上，稍晚出现的雅典陶器也具有同样的倾向。^③不过现在已经有学者确认其时间更早，几何陶文化后期即公元前750年左右，东方艺术的影响逐渐清晰起来。这一点在底比隆画家工作室里装饰花瓶的动物图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④这些装饰对我们理解东方化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们对动物形象的描述，而且在于他们包含了特殊的主题：正在捕食的猫科动物，经常以正在攻击猎物的姿态呈现。^⑤这些动物中最常见的就是狮子，不管是单独出现还是出现在捕食场景中的狮子，都能够在阿提卡陶瓶中看到。^⑥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狮子和豹子同斯芬克斯、塞壬、戈尔工以及其他有翼的怪物一样神奇。已经有学者精确地指出了这些动物模型的来源，例如，从形态上说，狮子首先是赫梯的，后来是亚述的。^⑦

还有一些在希腊发掘出来的东方艺术品也值得注意。象牙雕刻毫无疑问来自东方，虽然这种技艺后来被希腊人采用。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鸵鸟蛋和来自红海的砗磲贝壳也是如此。珠宝则更常见，如各式金饰、彩陶珠以及玻璃珠，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赫拉的三串桑椹状耳饰当属此类。宝石、印章的使用和传播更有力地证明了与东方的联系。在伊斯基亚岛（Ischia）发掘出了近百枚叙利亚—西利西亚的印章。莱夫坎迪的陵墓中发现了叙利亚和埃及风格的类似护身符的饰品——葬于厄立特里亚英雄祠（Eretria Heroon）的王子佩戴着一枚镶嵌在黄金上的圣甲

①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9.

②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9.

③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77页。

④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7.

⑤ B. Schweitzer, *Greek Geometric Art*, trans. P. Usborne and C. Usborne, London: Phaidon, 1971, pp. 186-200.

⑥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7.

⑦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77页。

虫形护身符。此外，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圆柱形印章在希腊的萨摩斯、提洛岛和奥林匹亚都有出土。^①

希腊艺术的“东方化”，不仅是指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同时，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其直接证据就是希腊人在制造中吸取了新的技术性工艺，这不是简单地通过购买成品就能做到。希腊手工业者们旅行到了靠近东方的某些地区，并在贸易据点建立起作坊。在那里，他们可能方便地见到东方的工人。艺术家的这类迁移从他们自己制造的物品中可以得到确认，这些技术只能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金丝细工饰品和粒化技术、宝石的切割、象牙雕刻、赤陶模的使用和青铜的失蜡铸造法等，都是这类技术的例证。^② 这些技术都不是彼此进行远距离的接触能够学到的，而是需要一段学徒过程，其间彼此曾密切合作，交流过种种细节问题。并且，工匠因有一技之长，与定居的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截然不同，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就为希腊手工艺者或者艺术家学习东方技术提供了条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希腊人对东方艺术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面对各种外来模式，希腊工匠的反应是改造多于模仿。^③ 浅层次的改造体现在技术层面，如东方失蜡铸造技术中的蜡芯以沥青为芯被改成了以树脂和麸糠作芯。^④ 更多改造过程则体现在对近东图像主题的转换中。例如，东方主题的牛或牛犊，在希腊的环境中则转换成马或马驹。同样，阿提卡艺术家借用了近东复合生物的观念，但是随即创造了希腊特有的风格。同样的借用和改造也体现在希腊艺术家对东方生命之树的描绘，将其以本土的几何陶形式展现出来。^⑤ 这一改造过程还体现在对某些特殊主题的选择性借用，如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的群组图像，是典型的东方风格，但是在阿提卡的后期几何艺术家那里，变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位马夫被群马所包围，群马按两级或三角排列，然而又有两个人坐在中间的凳子或石块上，这又是典型的本土风格，很少发现有近东的原型。^⑥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东方原型的出现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排列的顺序或形式结构方面，而在场景的风格和具体图像方面的影响则少得多。正如默里所说，希腊艺术从来不是东方的派生物，借鉴和采纳都是创

①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19; pp. 162-163, note 2-8.

②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The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80, p. 71.

③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pp. 78, 81; J. L. Benson, "An Early Protocorinthian Workshop and the Sources of Its Motifs," *Babesch*, vol. 61, 1986, pp. 13-14.

④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p. 57.

⑤ J. N. Coldstream, *Greek Geometric Pottery: A Survey of Ten Local Styles and Their Chronology*, London: Methuen, 1968, p. 67, note 2.

⑥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9.

造性的。正是几何陶的叙述与东方自然主义的结合，让希腊的艺术，因此也是西方的艺术，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在艺术领域以外，学者们研究较多的是文学和神话方面的“东方化”。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与东方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荷马史诗虽于古风时代才最终成书，不过口头传颂已经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在传颂过程中，无疑吸收了多种文明元素。自古以来就有学者将荷马史诗与希伯来圣经相比较——两者都是在以宗教和语言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单元中传播的历史、神学和叙述传统；两者在悲情主题（如以女儿献祭）、诗歌技巧（如明喻修辞）、宗教范式（如发誓与诅咒）等方面都有诸多共同之处。^① 布鲁斯·卢登在《荷马的〈奥德赛〉与近东》一书中通过对《奥德赛》与《创世记》、《出埃及记》等近东文本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奥德赛》融合了多种不同的神话传统，所有这些传统都能在近东找到对应物。尽管从近东内部来说，这些神话或传说又分属不同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乌加里特等地，但大量故事都集中在旧约圣经中。^② 默里认为，赫西俄德的《神谱》，其核心组织原则是“继承神话”，其结构和许多细节都与东方的继承神话高度对应。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令》，虽然其中详尽的建议完全是希腊式的，但该诗篇的总体设想让人想起东方著名的智慧文字，核心神话的某些部分与东方类似。^③ 伯克特也对希腊的宇宙神话与赫梯的库马比神话进行了比较，他还比较了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赫拉克勒斯形象与诸多近东神话的相似之处。^④ 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作品中的很多故事也被证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很多对应关系。^⑤ 奥林帕斯 12 主神中，狄奥尼索斯、阿芙洛狄忒、阿波罗、阿尔忒弥斯都已证明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⑥ 关于其他希腊文学作品，包括其他史诗、抒情诗、寓言，尤其是涉及神话传说的作品，都有学者从

① Sarah Morris, "Homer and the Near East," p. 599.

② Bruce Loudon, *Homer's Odyssey and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14.

③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 80—83 页。

④ Walter Burkert, "Oriental and Greek Mythology: The Meeting of Parallels," in Jan Bremmer, ed., *Interpretations of Greek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0-40.

⑤ Charles Penglase, *Greek Myths and Mesopotamia: Parallels and Influence in the Homeric Hymns and Hesio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64-165.

⑥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vol.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pp. 453-464.

不同角度将其与东方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①

三、“东方化革命”的想象

但是，“东方化革命”研究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证明这些相似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不是按照自身的规则独立发展起来。当然，学者们可以根据地理空间上的相互连接、年代上的先后关系作出一些推论。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希腊文学所具有的本土性特征。荷马史诗的英雄传统是希腊社会的独特产物，其中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体现的是希腊人独特的人文伦理观。^② 尽管赫西俄德借鉴了外来的模式，但他的思想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他对社会的关注让他通过创造世代的观念将神灵的世界和人类世界联系起来，并从神灵那里派生出抽象的政治概念，这种思想模型在东方并无对应物。^③

神灵起源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某些希腊神灵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受到东方的影响，但是源头显然不是唯一的，并且在最终成型之时，已经完成了对其他文明元素的吸收和改造，所彰显的主要是希腊特性。以阿波罗为例，阿波罗显然是一个起源于希腊以外的神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阿波罗神名起源于北方，其神职主体起源于亚洲，外来文化元素在传播和融合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希腊原住民的某些崇拜成分。在人们对阿波罗崇拜的某一发展阶段，还吸纳了许多不同宗教元素和小的神祇，这些众多宗教元素和小神祇逐渐汇聚到“阿波罗”的名称之下。^④ 关于这些汇聚到“阿波罗”名称之下的宗教元素和小神祇的具体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知道有三种成分：西北多利斯希腊（Dorian-northwest Greek）成分，克里特米诺斯

① 除了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和韦斯特的《面向东方的赫利孔》以外，主要作品还有：M. Finkelberg, “The Cypria, the Iliad, and the Problem of Multiformity in Oral and Written Traditio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95, 2000, pp. 1-11; R. Bollinger,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extual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 750-650B. C.),” in R. M. Whiting, ed., *Mythology and Mythologie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Influences (Melammu Symposia II)*, 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2001, pp. 233-264; J. Haubold, “Greek Epic: A Near Eastern Genre?”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 48, 2001, pp. 1-19; Carolina López-Ruiz, *When the Gods Were Born: Greek Cosmogonies and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tc.

② Sarah Morris, “Homer and the Near East,” p. 599.

③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 84 页。

④ 李永斌、郭小凌：《阿波罗崇拜的起源与传播路线》，《历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Cretan-Minoan) 成分, 叙利亚赫梯 (Syro-Hittite) 成分。^① 然而, 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艺术中, 以阿波罗为原型的雕塑艺术形象的发展一直远胜过其他神祇, 这种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勒洛斯的阿波罗神庙铸成那些青铜塑像之时 (约公元前 750 年)。这些阿波罗塑像一般都是以年轻人形象出现, 随着希腊艺术的不断成熟, 这种形象逐渐上升到理想高度, 经过后来的进一步净化和提升, 而明显具有神圣性, 赋予希腊文化一种特殊的气质, 而代表这种文化的神就是阿波罗。甚至有学者说, “阿波罗是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一切使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 特别是与周围野蛮民族相区别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美, 无论是艺术、音乐、诗歌还是年轻、明智、节制——统统汇聚在阿波罗身上。”^② 同样, 其他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的神灵, 在其发展过程中, 也逐渐融合了多种文明元素, 最终形成了希腊人所特有的奥林帕斯神系及其宗教崇拜。

还有一个领域是文字和语言。希腊文字的基础是腓尼基字母, 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希腊字母的形状是对腓尼基字母的改写, 两种字母表的顺序基本一致, 甚至绝大多数希腊字母的名称也是从腓尼基语接受过来的。腓尼基语向希腊语的转写几乎是机械的, 只有在一个基本方面例外: 元音。元音的发明正体现了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创造性的修正。绝大多数希腊元音的形式源自腓尼基语的辅音或者半辅音字母, 后者在希腊语中毫无用处, 只是被视为简化过程的音节符号, 而元音的发明则将这些音节符号转变成真正的字母符号。在希腊字母表中, 主要的元音和辅音首次独立出来, 各自单独表达。这一系统仍为绝大多数现代语言所使用。^③ 马丁·伯纳尔考察了希腊语中外来语的现象, 提出了数百个他认为“可以验证的假设”,^④ 当做希腊文明具有亚非之根的重要证据。然而, 文字和语言领域的几百个案例仍然不足以构成文明整体特性。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文字的运用对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尽管有学者认为, 文字应对古风时代的绝大多数变革负责, 在走向民主、逻辑或理性思维的发展、批判的史学、法律的制定等方面起到了辅助或激励作用。但是, 文字的作用是加强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趋向, 而不是对其进行基本的改造。^⑤ 希腊社会具有的独特性在文字到来之后并没有消失, 而是进一步朝着自己特有的方向前进, 从而发展出与东方文明特征迥异的古典文明。

至此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结论: 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

①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trans. John Raff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 144.

② W. K. C. Guthrie, *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85, p. 73.

③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 86—87 页。

④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vol.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p. 73.

⑤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 92—93 页。

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在一些具体社会文化事项方面,也能看到东方的影响,如哲学、^①建筑,^②还有会饮等社会风俗,^③以及一些实用的物品如钱币^④等,至于是否能称得上“东方化”,还没有足够多的确凿证据支撑。但是在诸多领域,希腊人仍然保持了本土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如史学、抒情诗、舞台剧等。东方社会的许多独特事物也没有在希腊找到对应之物,如巨大的宫殿、强大的王权、连续性的王朝等。

“东方化”最初是一个艺术史的概念。艺术品方面的比较研究相对较易,因为有具体物件和作品作为证据。一旦将“东方化”从艺术史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难题就油然而生。艺术史术语“东方化”,其实是文化传播论者用以解释历史的方式,可能更适合于物质文化,而非观念的历史。具体文化层面的转换和改造比整个社会其他层面的转换更容易把握,然而以人工物品的流动为基础来建构文化交流甚至历史发展的脉络,还需要更多社会生活领域层面的分析。

实际上,“东方化革命”是“东方化”和“革命”两个概念的复合体。“革命”最初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的是相对较短时间内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改变。^⑤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革命”一词也被引申到其他领域,其基本含义仍然指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如古希腊历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革命”,^⑥指的就是城邦的兴起这一“结构性革命”。^⑦由于一些学者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750—前650年,^⑧恰好与默里所提出的“东方化时代”吻合,而希腊城邦社会的兴起也确实和希腊与东方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同时发生,这两股历史潮流对希腊社

① 关于诸多具体案例的比较研究,参见 M. L. Wes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 Erwin F. Cook, “Near Eastern Sources for the Palace of Alkinoo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08, 2004, pp. 43-77.

③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74页。

④ Alain Bresson:《吕底亚和希腊铸币的起源:成本和数量》,《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⑤ Aristotle, *Politics*, 1. 1301a.

⑥ 1961年,美国古代史家切斯特·斯塔尔在其所著的《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说法:“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B. C.*, New York: Knopf, 1961, p. 160)

⑦ Anthony M.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5. 最近的论述见 Ian Morris, “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 in Kurt A. 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s, eds., *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09, p. 65. 关于“公元前8世纪革命”这一概念的辨析,参见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⑧ 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B. C.*, p. 160.

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此，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的辨析，关键在于艺术上的“东方化”是否引起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本文认为，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东方化革命”只是一种想象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

就公元前 750 年—前 650 年的希腊社会来说，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城邦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而希腊城邦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在公元前 750—前 650 年这一百年时间里突然发生的，而是迈锡尼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缓慢发展的结果。这种以城邦制度为框架的发展，经历了从迈锡尼时代到古风时代，再到古典时代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决定了希腊文化的基本特质，这种特质与东方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艺术与社会中人的尺度与标准”，^① 单个人作为公民，在独立的城邦中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这些智识上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希腊人，在不同于东方的公共空间上所展开的自由辩论等公共话语，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强烈自我意识。尽管这一时期的希腊社会在艺术方面经历了一个“东方化时代”，除了艺术等领域以外，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但是在与东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希腊人所摄取的总是适应于本土土壤的元素，因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东方社会完全迥异的城邦体制。^② 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而已。然而，一些学者却着重强调这一时期东方影响的作用，甚至将这种影响夸大到“革命”的层面。

四、想象的根源：古典学遭遇东方学

“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深层次背景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的碰撞。

18 世纪中期，随着欧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勃兴和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股民族主义的风潮。加之学术上的日益专业化，西欧社会开始了一场将古希腊理想化的文化运动。^③ 这一运动以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来寄托和抒发现代欧洲人的精神诉求和政治目的。温克尔曼、赫尔德、歌德、洪堡等文学巨匠和思想大家，将古代希腊理想化推向新的高度。

^① 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

^② 关于希腊与东方在政治思想和体制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参见 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0-59.

^③ 关于这一主题，极为精彩的论述见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 Helle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1777年,沃尔夫(Wolf)进入哥廷根大学,要求注册学习“语文学”或“文献学”(Studiosus Philologiae)。沃尔夫用“Alterthums-wissenschaft”(意为“古典学”)一词来指称他所从事的研究,这标志着现代古典学正式确立。^①古典学虽然以研究古希腊拉丁文献为基础,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表述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因此很快与温克尔曼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融为一体,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把文学或精神文化同某个独特的民族或部落、某个独特的人种联系在一起。独立起源与发展的概念取代了文化间相互影响的模式,成为理解文化的关键。

语言学者对“印欧语系”的发现——即大多数欧洲语言和波斯语及梵语都衍生自同一原始语言,强化了希腊、罗马、日耳曼之间的联系,因此把闪米特语世界排斥在外。但是为希腊人的独立性辩护,还得否认他们在印欧语系的大家庭内与印度的亲缘关系,以确立一种观念,就是将古典的、民主的希腊理解为一个自成体系、自主发展的文明模式。^②

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的影响下,加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对东方的全面优势,以及近代以来“东方”的衰落和西方学界对东方衰落根源的解释——专制、腐朽、没落的景象,西方学者因此倾向于把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的影响降到最低,甚至有意将东方因素从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文明中“驱逐出去”。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闪米特以及埃及的民族和国家衰落了几个世纪,尽管他们自己有自己古老的文化,但除了少数手工艺技艺、服装、品味低劣的器具、陈旧的饰品、令人厌恶的偶像崇拜和更令人反感的各路虚假的神祇以外,他们不可能对希腊人有任何贡献”。^③

与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古典主义相对应的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兴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④思潮。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东方(‘东方’这个名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

① R. Pfer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73; 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12.

②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p. 4-5.

③ 转引自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5.

④ Orientalism 这一术语的“东方主义”内涵最早由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参见· 202 ·

的光明。”^① 黑格尔从地理的角度来寻求或规定历史的起点，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于东方，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了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黑格尔认为“亚细亚是起点，欧洲是终点”，也就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东方文明的先发性，但是他对东方的认识确实充满了想象。在黑格尔眼中，“蒙古”同“中国”一样，都是“神权专制”的形象，是“封建大家长主宰一切”的形象。而对于印度人，他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由于“印度人天性的一般要素”就是“精神处于梦寐状态的特征”，印度人还没有获得“自我”或“意识”。同时，由于“历史”必须是“精神”发展上一个主要时期，加之印度人并非是能够有所行动的“个体”，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扩张，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别人所征服。概而言之，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数原殖民地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特别是前殖民统治国家，继续以种种方式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萨义德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微妙却非常持久的偏见，并决意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期打破这一偏见，为东方正名。^③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体系，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④ 以《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出现了东方研究的热潮。

带有浓厚孤立倾向的古典主义和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东方主义的合流，曾在西

①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从学理层面讲，Orientalism 翻译为“东方学”是可以接受的，也被很多学者所认同和采纳。不过，Orientalism 更多时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因此，译为“东方主义”更合适。在萨义德之前，已经有维克托·吉尔南（Victor Kiernan）、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和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等诸多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有学者认为，“东方主义”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业已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3页）也有学者认为，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由“经典东方学”、“现代东方学”、“当代东方学”三个时期构成。黑格尔是其学理层面的始作俑者，萨义德是将其提升至当代话语机制层面的集大成者。（参见费小平：《东方学：从黑格尔到萨义德》，《外国语文》第25卷第6期，2009年12月）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41页。

③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 xviii.

④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 3.

方学术领域引起质疑。19 世纪的几大重要发现,^① 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 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这种重新认识过程的具体体现。这种重新认识自 19 世纪末开始, 在 20 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由涓涓细流汇成一股学术潮流, 反映了西方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 “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伯克特是这一潮流在当代的代表人物, 他的《东方化革命》, 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抛弃传统观念: “窃望拙著能充当一名打破藩篱的使者, 将古典学家的注意力引导到他们一直太少关注的领域, 使这些研究领域更易接近, 甚至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或许它也能激励东方学者(他们几乎同古典学家一样有孤立的倾向) 继续保持或重新恢复与相邻研究领域的联系。”^②

然而, 澄清希腊与东方的联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黄洋教授正确地指出, 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领域, 更为充分的研究极有可能进一步修正我们对于早期希腊历史的认识, 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 不仅需要掌握古代希腊文献, 而且还要有比较语文学的训练, 掌握古代西亚和埃及的文献以及多种语言, 也要对考古材料有着充分的了解, 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有条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③ 虽然他的告诫对象是中国学者, 但是笔者认为, 这同样适用于西方学者, 适用于所有正在或者将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责任编辑: 焦 兵 责任编审: 姚玉民〕

① 伯克特认为这些发现包括: 一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破译让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重新浮现, 二是迈锡尼文明的发掘, 三是对古风时期希腊艺术发展中东方化阶段的确认。(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2)

②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p. 8.

③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第 191—192 页。

poetics.

(9)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hythm in Chinese New Poetry *Zhao Liming* • 164 •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shiqi shuo*, 诗气说)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Chin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the basic elements of lyrical poetr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breath” or *qi* (气). Poetry is the message of life; rhythm echoes breath, and the emergence of poetry is the reduction of breath to syllabl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 of nature revealed by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wa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rhythm of the new poetry. Because the aims of their construction differ, treatments of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in modern poetry are divergent: the free verse school reads in it the naturalness of rhythm; the traditionalists see in it the metrical verse of five and seven syllable lines.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which takes life, nature and freedom as its original material, gives a transcendent power to the new poetry, one that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written words and penetrat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the crooked and the straight, of different concepts of rhythm, but can also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all ages and all countries to set the direc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rhythm of new poetry.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breath of poetr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y is it so?” asked by the theory of natural rhythm, and provides a historical basis for integrating different theories of rhythm and establishing “the rhythm of breath.”

(10) The Collision between Classical Studies and Oriental Studies: The Modern Imagination of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of Ancient Greece *Li Yongbin* • 187 •

The concept of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in ancient Greece, first put forward by Bergman as early as 1990, gained a wide audience through Burkert’s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The proposition of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influence are in fact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wo topics of “orientalizing” and “the orientalizing epoch.”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is not itself a purely historical concept, but blends many elements of imagination. It is in fact the result of an expan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entalizing period in art history and the collision of classical and oriental studies and of classicism and orien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politics.